

发、文化遗产保护等现实问题;二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由学者、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合作机制;三是探索一条如何把学者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的实践活动的工作模式;四是组建一个由人类学者、文史学者、旅游学者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而不是由同一学科背景的学术团队“包打天下”。

从这个项目的运作来看,人类学的知识是如何介入旅游开发工作的呢?显然,我们提供了专业性的文化挖掘和调查工作,而不介入具体的旅游开发工作,不过,如果没有我们的文化调查,旅游开发就不可避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学家的工作只是发现和描述文化,让大家知道地方社会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有哪些,告诉人们这里有什么,原来是什么,现在还没有被人们关注到的文化对于将来的意义在哪里等等。换言之,我们的价值在于“发现文化”,挖掘文化资源,为“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动力。

在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作为文化研究角色“在场”的人类学者的参与,可以起到文化挖掘的前置作用,而且还能够确保文化旅游内涵的本真性。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要遵循的工作模式为:组建包含人类学、旅游规划、市场开发等在内的多学科的文化研究团队,由文化研究团队进行文化调查,然后由文化研究者和旅游规划者合作完成“文化资源化”的策划,最后由旅游规划者、市场开发者和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完成“文化再生产”,形成旅游产品(旅游服务)市场。这种由各相关利益群体“梯级参与”的工作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贯穿学者、社区、政府、市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梯级参与”原则;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它们各自的角色定位:学者进行文化挖掘,政府进行旅游规划,村民通过社区参与,市场经由资本运作等,有了这个协调机制,就可以有序地推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该所执行所长 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1-12-28)

## 诗意的行走与旅游的负重

张进福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我讨厌旅行。”半个世纪以前,结构主义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如是说。但正是“讨厌旅行”的列维-斯特劳斯因其讨厌的旅行缔造了经典名篇《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 1955),成就了人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于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巴西的旅行经历也成为人类

学子的必读圣典。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讨厌的旅行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艰辛且局限于少数人身上,也已从最初的旅程性质演变为带有娱乐性质的旅游活动,并且把地球从“遥远的他乡”转变为“地球村”(McLuhan & Fiore, 1968)。仅以2010年为例,全球国际旅游人次就达到9.4亿人次;我国国内旅游人次更高达21亿人次。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的异地体验,旅游所追求的“畅爽”(flow)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追求。旅游已经成为无法忽略、无可回避的当代普遍的社会现象。于是,让更多国民能够自由地行走的“更多国民参与、更高质量分享”(戴斌, 2010)成为高层旅游智库的真知灼见;于是,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民族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旅游由此继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业”之重再次背负上沉重的压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国际上以尼尔森·格雷本(Nelson Graburn)、迪恩·麦克奈尔(Dean MacCannell)、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爱德华·布鲁诺(Edward Bruner)、丹尼森·纳什(Dennison Nash)、艾瑞克·科恩(Eric Cohen)、丹尼尔·伯斯汀(Daniel Boorstin)等一大批闪光的姓名为代表的正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纷纷在盛年盛名之下涉足旅游研究,从而涌现出一大批迄今难以逾越的旅游研究经典,把旅游研究真正地带入严肃的学术殿堂(Smith, 1992)。肇造于此的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茁壮成长且有参天之势。这并非偶然。它反映的不仅是严肃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大师开始关注旅游现象,更重要的是,大师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旅游超越于旅游之外的深刻内涵以及旅游背后的普世性意蕴与价值。可以说,当代旅游为社会学、人类学等传统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沃土与田野乃至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与反思,也为这些传统学科提供了解构当代社会和认识“我们”自己的另一种可能视角。

小而言之,旅游是旅游者个体价值取向、社会观念与社会环境综合影响的“单元行动”;大而观之,在社会永恒的时间与空间中,旅游活动生生不息、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旅游现象具有绝对性与长久性。由于旅游对精神状态改变所呈现的某种仪式性与神圣性,特别是对人类生活时间流逝的测度和对“在家”世俗状态(日常生活)与“离家”神圣状态(旅游生活)的分野而被视为“神圣旅程”、“世俗仪式”(Graburn, 1977, 2001; 张进福, 2010)。

迪恩·麦克奈尔(Dean MacCannell, 1976)更进一步把旅游视为一种当代朝圣。著名象征主义人类学家维克多·特诺(Victor Turner, 1978)甚至提出“如果朝圣者是半个旅游者,那么,旅游者就是半个朝圣者”的论断,进而提出“朝圣和旅游已经成为移动世界的新的隐喻”(Turner, 1992)。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许多变化的历史经验中,旅游仿佛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通过仪式”(彭兆荣, 2007)。由是观之,旅游是生活化的表现与仪式、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野,生活则是泛旅游的社会存在。

籍由对个体生命的标度和对社会的结构性指示形成的先天性仪式特征与世俗中展现的神圣性,旅游客观上具有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救赎社会失范的“安全阀”作用,并借助其内在的神圣性与外在活动所体现的“国家在场”在民族事务、信仰与价值、社会认同的处理与实践方面可起到关键作用,并有助于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有助于地区与世界和平(de Kadt, 1979)。当然,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案也让我们看到旅游藏污纳垢的负面形象。

严肃也好,肤浅、快乐也罢,都是旅游现象的客观呈现。可见,在传统的经济功能之外,旅游背负着太多的东西,遑论旅游蕴含着的主客关系、凝视与权力话语、民族国家、历史记忆、身份认同、象征与符号、仪式与信仰、社会影响等更为深刻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话题。追根溯源,旅游者追寻异文化异空间“中心”的“反结构”行为本身源自于旅游者所处社会内部的“推力”。旅游在其纷繁复杂背后隐藏着当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指征,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象征着我们的社会,是一般社会关系在旅游领域的映射。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旅游深刻地触及社会的内部构造,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的表述、表达和表演的范式(Clifford, 1997)。

显然,旅游现象不应仅仅被看成是热闹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供求关系,也不应仅仅被看成是简单的空间转换关系,而应被看成是人类认识自身需要、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内在需求的反映和人类社会变化轨迹的表现之一。换言之,旅游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人类自己和我们所处社会的途径和视角。按照迪尔凯姆(Durkheim, 1985)从社会本身寻找社会生活的说明、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进程的最初起因的逻辑思路与方法,旅游研究不应局限于旅游现象的表征,即不能“就旅游论旅游”,

而应把旅游视为一种“透镜”(Graburn, 2007)。旅游就是一个万花筒,透过旅游,我们可以看到人间万象;透过旅游,我们可以研究我们身边的社会,研究旅游对于人类的本质与意义所在,研究旅游对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即,旅游研究应该在更深层次上关注人的本质需要、人的基本权利、人类的整体社会福利(张进福, 2007)。旅游研究就是要探讨隐藏其后的关于人类自身、关于社会整体问题的“终极思考”。因此,尽管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进行现代民族志研究是不可能的”,但迪恩·麦克奈尔(Dean MacCannell, 1976)通过旅游者“进行一项关于现代人类和现代社会的民族志研究”的野心被《The Tourist》(电影,中文译名《致命伴旅》——编者)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证明是可行的。

总之,一方面应该消除旅游者身上的负重,让旅游者——不管肤浅的傻瓜还是严肃的追寻者——能够自由、有尊严,甚至能够愉悦、诗意地行走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之上而无需承受太多;另一方面,从研究层面上看,在消除旅游身上的经济负重之外,还应充分认识到旅游超越于旅游之外的负重。这样,我们距离认识复杂的旅游现象将更进一步。

(作者系该系副教授;收稿日期:2011-12-07)

编者按:本栏目的缘起来自2011年9月以“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为主题的阳朔会议,作者也是以参会代表为主体。他们围绕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及旅游地理学中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议题不一定集中,但思想性和启发性够强。也期望以此引发多学科对旅游研究的全面关注和深入对话。

[本期本栏责任编辑:宋志伟;特邀责任编辑:孙九霞;责任校对:吴巧红]

#### • 预 告 •

2013 年笔谈主题:

- 第 1~2 期“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与营销”
  - 第 3~4 期“地方性与旅游业发展”
  - 第 5~6 期“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旅游业发展”
  - 第 7~8 期“旅游节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 第 9~10 期“旅游规划中的科学与艺术”
  - 第 11~12 期“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
- 欢迎踊跃投稿。